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印 顺 集

黄夏年 主编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顺集/印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2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黄夏年主编)

ISBN 7-5004-1777-2

I. 印… II. ①印… ②黄… III. ①佛教-研究-文集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20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12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0. 00 元

缘 起

几年前在国内的一次宗教学会议上，几位代表与笔者谈到了中国近现代佛教。交谈中除了提及那些至今仍时时为人们所引述的大家，也还说到好些当年名噪一时而今已鲜为人知的大德。所有这些人的著述，说起来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以至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化所不可不读的。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大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有的已逾半个多世纪，但那怕是今天读来，往往也还有新意，这也许便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心理的继承性，说得更明白些，从前的人和今天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总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些人中，有的是僧人，当然是学问僧人，也有的是俗世中的学者，但成就斐然。今天要找到他们在几十年前发表和流传的文字，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了。这就萌发了我们搜集并编印《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的意愿。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夏年君又在编辑部谈及此事。黄君是《世界宗教研究》的编辑，对于国内佛教学研究动态和佛教史料颇为留意，也有素养。一经取得共识，我们便分头动手做起来。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努力，终于结集完成了这部能够反映近现代佛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丛书。可以这么说，本丛书中各集子的主人都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的佛教史或佛学研究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文字和思想肯定是会具有长久的意义的。

E626/46 23

我们的这套书——《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的作者和论文，大致反映出三个特点。这恰好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

首先，是它们反映出中国近现代佛教学研究已经具有了以往不曾有的科学倾向。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其辉煌时代当然是在隋唐时期。宋元以降，说真的，佛法已经呈现式微之相了。到了明清时代，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臻于烂熟，早就不得不匍匐在王座下的佛教更是失去了真精神。据说清世宗曾经发愿要以十年专治国家，再以后十年专弘佛教。世宗在位十三年，无论如何，当时或是后来时代的佛教“气运”都没有好起来。明代不管怎么说还有四大高僧，入清则似乎“法眼灭矣”。每况愈下的佛教，到了清末，除了仵诵法事、坐香念佛，而义学几绝。只是进入民国以后，佛教才有了几分转机。当时很有一些硕学名家提倡鼓吹佛教三学并且身体力行，为世树立模范。其结果，义学也因之产生了灿然可观的成果。

但此时的佛教义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依经作注，由注而释，而是有新的时代精神渗透其间的佛学或佛教学。尤其“五四”运动之后，从事佛学研究的人虽说仍有僧人，但更有成绩的又多是俗世中的学者。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界经过了近世西方人文科学精神的洗礼，有意无意地接过了以实验科学为根砥的研究方法。学者们研究佛教，不能不说是出自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又借鉴了外来的研究工具。本文集所辑入的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作品便代表了这样的科学的学术倾向。这一倾向，同样也在著名学问僧人印顺法师等文字中的鲜明表现出来。

其次，从我们这套文集的内容看，又展示出近现代佛教

的另一特点：对佛教作出较大贡献的是在家的俗信徒，称为居士的一批知识分子。象杨仁山、欧阳竟无等等，他们搜求海内外佛教典籍刊行印发；他们建立了佛学教育机构，培养僧俗佛教人材；他们矻矻终年，为维系“一代圣教”作他们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的那个时代兵燹不绝，民不聊生，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历尽艰辛而无怨无悔。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玄奘等古德为法捐躯的精神，这种人格力量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我们的这套集子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又一特点——它具有强烈的人世性或政治性。这是中国近世社会所遭遇的特殊历史环境所赋予的。看看谭嗣同，可以理解为什么佛教可以在近代社会中，在热切期望中国强盛起来的仁人志士那里成为思想武器。梁启超为谭嗣同《仁学》一书所作的序，便部分地揭示出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再看杨度，以往的“筹安会君子”之一，他在拥戴“洪宪皇帝”的活动失败以后，退出政界，虔心研究佛学达十年，但最终他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国特殊的近现代历史环境中考察这一现象，我们也许会对佛教有新的认识？从佛教僧人方面来看呢，太虚法师一生的活动就更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了。太虚决不只是一个博学的佛教义学僧人，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影响，他的奔走呼吁，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透出了前所未有气息。我们若读他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不得不然的感觉。这是历史的必然，抑或也透出因缘的宿力？当然，这一时期佛教中也有更为传统的人物，比如终生致力于弘扬净土一宗的印光法师。

我们选编本丛书各文集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学术性。所选文章应该是优秀的佛学或者关于佛教的研究著述。二是史

料性。所选文章应该反映佛教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某一特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戚戚相关。由此而附带声明一句，所有文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遣词造句、发言主张当然有其所处时代的风格。除有的文集主人所发的议论与现实严重相悖而不能不删节外，我们一般均作原文照录的处理。愿读者识之。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目 录

缘起.....	(1)
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伟人..... 郭朋	(1)
汉译圣典在佛教中的地位	(14)
大乘三系教判	(19)
大乘三系的商榷	(34)
《中论》之特色	(40)
《英译成唯识论》序	(52)
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	(59)
《起信论》平议	(79)
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	(90)
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	(133)
人性.....	(141)
人间佛教要略.....	(155)
学佛三要.....	(172)
自利与利他.....	(182)
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	(191)
太虚大师的菩萨心行.....	(202)

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伟人

郭 朋

当年，东晋名士习凿齿，在向谢安推荐道安法师的时候，说安公“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见梁《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这两句话，用之于印公，亦非常妥切！印公常说，他决不“标榜神奇”（按：本文凡引用印公文意，统见于印公有关著作，为了节省篇幅，均不一一注明出处）！而只是平实地如法如律地忘我写作，自行化他！印公不仅“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且还曾一度遭受到拥有“重威大势”的“群小”之辈们的恶毒诬陷，险遭不测！习氏还说：“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这几句话，用之于印公，也很妥切！“理怀简衷”，不正是对印公的一种写照吗？而“故所游刃”的“佛经妙义”，则印公又远远超过于安公，因为，安公时代的“佛经”，远远少于印公时代呵！只是印公门庭，确乎不如当年安公门庭之盛，这，大概也是由于“时节因缘”的不同吧！不过，“师徒肃肃，自相尊敬”，则印公似乎仍不让于当年的安公！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安公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而印公，同样也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

印公曾经说过：“在‘修行’、‘学问’、‘修福’——三类出家人中，我是著重在‘学问’，也就是重在‘闻思’，从经律论中去探究佛法。”——“从经、律、论中去探究佛法”，这正是印公的过人之处。环顾当今佛界，能够这样作的，又有几人！印公还说：“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而佛教所重的，正是在于“智性”、“悟性”均较强盛的“智增上”！而这，也正是印公的过人之处。

正是由于印公的“智增上”，所以他从事于佛研究，要“从论入手”。因为，“论书条理分明”，从研究论书入手，便能知道不同的论师之间以及各个部派之间，存在着不少的不同观点，从而也就能够从不同的经、论中，按图索骥，直探本源！这样，印公就逐步发现：诸如《成实论》所说的“十论”，《显宗论》的〈序品〉，以及《大涅槃经》的卷二三、二四，等等，都反映出了当时佛教思想上的不同论点。《发智论》是根本论，经过分别论究，逐步编集而成为《大毗婆沙论》成为公认的“说一切有部”的正统。由于“持经譬喻”师，在《大毗婆沙论》中受到评斥，所以他们放弃“三世有”（一切有）而改取“现在有”说，从而成为一时勃兴的“经部譬喻师”。而世亲的《俱舍论》，组织上是继承《杂心阿毗昙论》的；法义上则赞同经部而批评说一切有部（但有关修证，则还是继承说一切有部的古义）。同时，印公还发现：玄奘所译（编入《宝积部》的）《大菩萨藏经》，除第一卷外，其余的十九卷，是《陀罗尼自在王经》、《密迹金刚力士经》和《无尽意经》的纂集。《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是《宝云经》、《密迹金刚力士经》和《无上依经》的改写。《大方广总持宝光明

经》是以《华严》的《十住品》、《贤首品》为主，窜入密咒而编成的。

在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上，印公发现：“心清净，客尘所染”，本出于小乘的《增一阿含经》。在部派佛教中就写作的“心性本净”亦即“心本性净”，在大乘经中，多数译作“自性清净心”。《金刚经》中所说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原出于小乘的《杂藏》。《杂藏》经颂说：“若以色量我，以音声寻我，欲贪所执持，彼不能知我。”而《金刚经》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则是来自《阿含》的“观色如聚沫”以至“观识如幻事”。“大空”，出自《杂阿含》的《大空经》；“小空”出自《中阿含》的《小空经》。就是被中国佛教中的台、贤等宗宣扬为“圆顿”大乘教义的诸如“佛身无边”、“佛寿无量”以及“佛以一音演说法”等等，也都还是小乘大众系的一些“老僧常谈”！（同时，印公也还发现，在现存的《阿含经》里，没有说到“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也没有说到“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凡此种种，如非“寻流探源”，又如何能够发现、如何能够揭示出来？！印公的巨著《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以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等，都是这些方面的不朽之作！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上，能够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的，又有几人！

为了“把握纯正的佛法”，印公决心从流传下来的佛典中去探求本源。诸如：“人间成佛”怎样演进到“天上成佛”？从无我而发展到真常大我？从禁欲的“梵行”而演变到纵欲的男女结合的“双身法”（亦即世俗所说的“欢喜佛”）？诸如此类，印公都要从佛教的史实中去加以探讨、抉择。印公说：“泛神化（低级宗教‘万物有灵论’的改装）的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他决心要“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而且“不以传于中国者为是。

不以盛行中国者为是”，而只是“着眼于释尊之特见、景行”。印公还认为，如果不去博览群书，“精研广学”，便“无以辨同异，识源流”；更“无以抉其精微，简其纰谬”。正因为如此，所以印公方才能够摆脱传统的桎梏，而独树一帜，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振聋发聩，狮吼当代！

二

印公一再申明：“我不属于宗派徒裔”，“我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子孙，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大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专宗之习盛而经论晦”。特别是，如果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势必要为自家的思想理论所局限，自以为是，贬抑他人，从而引起无谓的争论。这，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印度佛教思想史上也差不多），可说是屡见不鲜的。不仅不同的宗派之间，互相非议，互相排斥，例如空有、性相之间，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是在同一宗派的内部，也往往是各不相让，势同水火！例如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禅宗的南北、顿渐之争。而一旦成了宗派首脑，便拥宗自重，往往出于门户之见，而不惜排斥（甚至摧残）异己，罗什门下之于觉贤，玄奘之于那提，便是显例！贤如罗什、玄奘，尚且摆脱不了这种令人憎恶的恶习，等而下之者，更可想而知！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印公才决心不做一宗一派的“徒裔”！印公着重于对印度佛教的探究，就是因为印度佛教是一切佛教的根源，弄清“根源”，方能明了其流变。而且，从印度佛教的长期演变中，综览全局，把握整体。中国佛教源于印度，所以印公尊重中国佛教，更尊重印度佛教。印公还特别申明：他信的是佛，而不是个别的任何人（包括所谓的“祖师”）。同时，印公还郑重申明：他信的是“佛法”，“所以，在原则上，我是在追究我所信仰的佛法，我是以佛法为中

心的。……我要以根本的佛法，真实的佛法，作为我的信仰。”“我的立场是佛法，不是宗派”。不做“一宗一派的子孙”，而以“根本的佛法”作为自己的信仰，所以印公才能超然于各个宗派之上洞察佛教的全局，把握佛教的整体。在中国佛教门庭林立、门户之见甚深的情况之下，印公可算是能够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一位佛学大师了！

三

当年，太虚大师曾经为了校正佛教中只重视死后、来生而脱离现实的流弊，特提倡“人生佛教”以为对治。不过，印公认为，中国佛教，向来是过分迎合民间信仰的，所以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什么天啦，神啦，对一些神秘的境界也极尽赞美之能事。这样一来，虽是“人生佛教”，仍然免不了受过去包袱的拖累，而抹上一层出世、消极和迷信的色彩。有鉴于此，印公提出了他的“人间佛教”的主张，并为此撰写了一部专著——《佛在人间》（收入《妙云集》下编之一）以阐明“人间佛教”的重大意义。

印公认为，传统的中国佛教，一向讲究“了生脱死”。由于重视于死（有人甚至说“学佛就是学死”！），也就重视于“鬼”。中国民俗，以为人死后就变成了“鬼”。佛教免不了也受到这种影响，所以不少的佛教徒，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准备在自己死了之后去做“鬼”。某些佛教学者，甚至主张信佛就要先“信鬼”，简直把佛教变成了“鬼教”！孔老夫子尚且说：“未知生，焉知死”，而佛教，却不管活人，只顾死鬼！这样，佛教又怎能不日趋没落呢？有鉴于此，印公特提出“人间佛教”以为对治。印公认为，真正的佛教，应该是“人间”的，只有“人间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教的真正精神！那些又神又鬼、神鬼不分的佛教，只能

给佛教带来无穷的祸害！

本来，释迦是人，他也是在人间成佛、在人间创立佛教；这也就是说，佛教本来就应该“人间”的。可是，在以后的演变中，佛教逐渐蜕化成了光是注重神鬼的鬼神之教，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生，终于走上了绝路。所以，印公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认定“佛在人间”，从而建立“人间佛教”。在印公看来，只有重建“人间佛教”，才能使佛教重新获得生机，获得活力。为此，印公大声疾呼：“我们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

四

本来，佛教并不“敬神”（天）、“敬鬼”的；而且，在皈依佛宝之后，就不能再去皈依“天魔外道”。天，就是天神；魔，则有神有鬼。佛教把天神概括为“天龙八部”，它们之中，有天，有神（还有禽兽）。鬼，则是“六道”众生之一，而且同地狱、旁生（动物）一起，并列为“三恶道”。天神，原是佛陀的“护法”（侍从、警卫），是给佛陀看门、护院的；鬼，就更等而下之了！有什么值得去“敬”、去“信”的呢？可是，印度佛教到了中、后期之后，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渐渐地被神化了！许多原来只能充当侍从、警卫的角色（例如“天龙八部”），现在，摇身一变，有的成了“菩萨”，有的成了过去的（或未来的）“佛”，于是，它们也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佛的殿堂，同佛一起，分享信徒们的礼敬和供养！佛教传来中国之后，许多民间传说中的各色“神”等，也纷纷走进了佛教寺院，成了佛教的善男信女们的礼敬对象。于是乎，长时期以来，便一直存在着神佛不分，神佛“混杂”的混乱现象。对于佛教的这种“精神污染”，也就一直在腐蚀着佛教！

对于这种“神化”佛教的混乱现象，印公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印公认为，佛教是宗教，而且是完全不同于“神教”的

宗教。那些把佛教“俗化”与“神化”(甚至“鬼化”),而决无助于佛教的昌明的。印公强调: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决不应把它“天化”,“神化”(更不能“鬼化”)!佛教不是“神(天)教”,更不是“鬼教”!印公认为,那些因适应低级趣味而把佛教“神化”、“俗化”(以至“鬼化”)了的,正是导至佛教逐渐走向厄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印公毕生致力于佛教的弘护事业,其愿力之一,就是要“净化”佛教,就是要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

五

前面说过,印公曾经明确表示:他决不“标榜神奇”!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来,佛教也是讲究“神通”(例如“六神通”)的,但是,在《律藏》中,释迦牟尼佛却又明文禁止佛弟子们轻易地示现“神通”,也就是,不许弟子们动不动就以“神通”来炫耀自己,吓唬别人。看来,这一禁戒,也算是一种防微杜渐的措施吧。不过,到了后来,这一禁戒,似乎越来越失去了约束力。一些真有“神通”的,自然要拿“神通”来显示自己的不同一般,就是没有什么“神通”的,也要挖空心思、装神弄鬼来愚弄别人。对于这种情况,印公也是深恶痛绝的。印公对于有些人动不动就说“前生后世”,说“神通”的行径,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佛法”。对于那种“寒山式”、“济公式”、“疯子喇嘛式”的“怪模怪样”的举动,印公也是非常反感的。印公认为,正派的佛弟子,不应“侈谈神通”,因为外道也有神通,如果以神通来建立佛教,那佛教也就和外道一样了!这又是一种多么卓越的见解呵!

与此有关的,还有所谓“修行”的问题。印公以对于那种“某人在修行”、“某人开悟了”之类的谈论,也是有自己的看法

的。印公认为，不只是佛教讲究“修行”，别的宗教，也都讲究“修行”，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例如中国的道教、印度的婆罗门教、阿位伯世界的伊斯兰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有他们各自的“修行”。所以，单是讲“修行”，并不一定就是佛教。其实，佛教也好，其他宗教也好，无非是都要教人平实、正常的生活，“修行”，应该也是这样。要“正常”，而不要装神弄鬼，怪模怪样。过去所谓“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那正是暴露出佛教已经走上了末流，所以才有这种弊端。当然，如果是真的“修行”，印公还是肯定的。印公认为，真的“修行”，身心是会得到一些“特殊经验”的，对于这一点，信仰宗教的人们是应该相信的，因为，“修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不可以“言传”而只能“心受”的“特殊经验”的。印公还说：“真正的修行，应该是无限的奉献！”要“无限的奉献”，这又是一种多高尚的精神呵！而印公所不赞成的，则是那种假借“修行”之名而招摇过市（意在“索取”）的荒诞行径。印公讲，他有很多看法，和别人的看法不同，在对待“修行”的问题上，印公的看法，和别人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过，我个人认为，如何看待“修行”，和如何看待“神通”一样，印公的看法，恐怕要和佛教的基本教义更加吻合一些的吧！

六

在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上，印公是这样说的：“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印公的这种治学态度，可说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其中也包括宗教——佛教在内），都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只有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探讨它的“本源与流变”，方才能够把握它的特质，洞察它的全貌。印公

还说：“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根源与流变，就不能不注意到佛教的史地。”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和地理环境中，去考察各个时代的佛教发展状况，就更加能够切实地了解佛教的真实情况。印公在对于佛教的见解上之所以能够远胜他人（包括古人和今人），同他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

在治学的具体方法上，印公主张作笔记、摘卡片。印公说，他记忆力不强（这自然是印公的谦虚），而三藏的文义又广，只有多多的依赖笔录，才能洞悉经、论内容而运用自如。例如，他从《阿含经》和《律藏》中，抄录了有关四众弟子们的事迹，法义的问答；又从《大毗婆沙论》中，录出各个论师们的不同见解和有关异部的史料——《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中的〈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和〈大毗婆沙论的诸大论师〉这两章，就是凭这些资料写成的。又如，长达百卷的《大智度论》，论文太长，又是随经散说，于是，他也用分类的方法，加以集录。如以“空”为总题，把《论》中所有说“空”的文字，都集中在一起。实相、法身、净土、菩萨行位等等，连所引经、论，也一一录出，将有关的论义，分门别类地集录出来（四部《阿含》，也都是这样的分类摘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对于文殊有关的圣典，也曾尽力摘录，分类、比较，于是，这位菩萨在初期大乘佛教中的风范，便充分的显现了出来。再如，印公在读《般若经》时，觉得《般若》“空”义，同龙树所讲的“空”义，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差异，于是便详细录出“般若”“空”义，又比较《般若经》的先后译本，终于发现：《般若经》的“自性空”，起初是“胜义的自性空”，然后逐渐演进到“无自性的自性空”。印公认为，平时集录资料，先要分类集录，然后再加以辨析、整理，这样，“书到用时”就“不很少”了！印公还希望人们：要想从无边的资料中去抉发深隐的问题，就必须多多的思惟以养成

敏锐的感觉。这，也可说是治学者们的必备条件吧！

印公还特别提到，从事于佛教研究者，也须要“温故知新”。“温故”，就是广读经论（以及古代的注解），但这还不够，还须要“知新”，也就是要从广读古代的典籍中，获得一种新的理解，新的认识，否则，那就要停止了，就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进步了！印公的这种尊重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限制所束缚，而是日新月异，精益求精的精神，又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呵！

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印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楷模！

七

印公写了一部《平凡的一生》，表示自己的“一生”是“平凡”的。其实，这不过是印公的自谦。实际上，印公的一生，是很不平凡的——应该说是“不平凡的一生”！环观当今的佛界，有哪个人能有像印公这样的经历（有些经历，简直就是“漫天风雨”、惊涛骇浪的）？又有哪些人能在佛教研究上达到像印公这样的高度、取得像印公这样的辉煌成就！

印公曾说，在传统的中国佛教徒当中，要想研究佛教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佛教徒门，认为佛是“修行”出来的，而不是“研究”出来的，哪里还需要什么“研究”佛教！因此，住在充满了传统的气氛的佛教寺院里，要想对佛教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实在是困难得很！是啊，人家整天都在那里忙于赶经忏，作佛事，接待善男信女以“广结善缘”，你却要关起门来搞什么“研究”，这又怎能不同人家“格格不入”、又怎能不被人家视为“异己”（甚至是“敌人”——所以每每遭受到人们的“敌视”！）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少年来，印公不得不“离群索居”、不住寺院而住精舍。）而印公，就是在这种环境（完全可以说是一